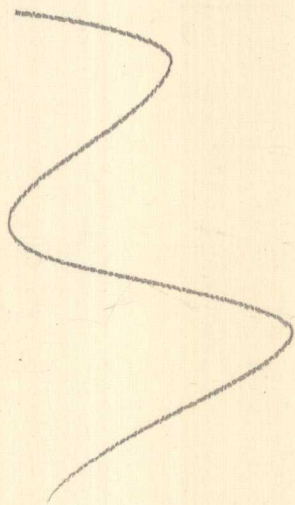


I 207.4427 / 17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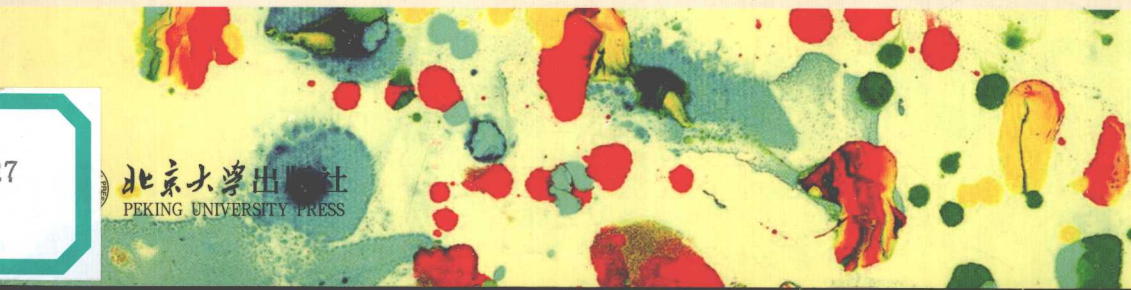
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

Hanyu Xingxiang Zhong De
Xiandai Wenren Ziwo

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

周志强 著

7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汉语形象中的 现代文人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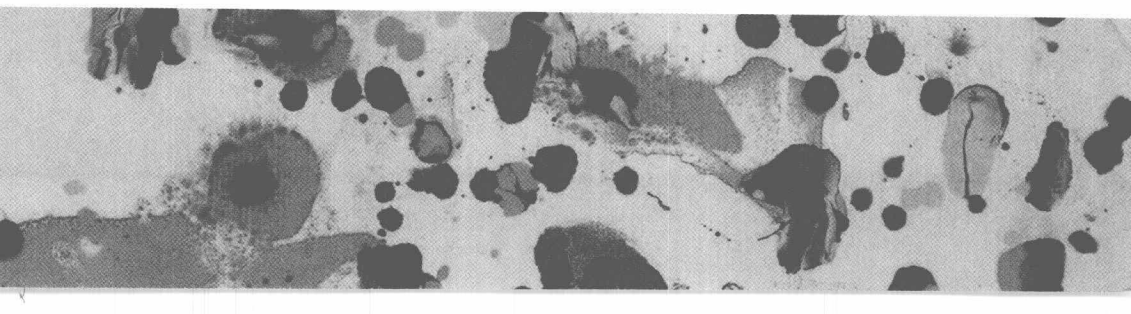
Hanyu Xingxiang Zhong De
Xiandai Wenren Ziwo

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

周志强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周志强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8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

ISBN 978-7-301-15539-4

I. 汉… II. 周… III. 汪曾祺(1920~1997)—短篇小说—文学研究
IV. I207.4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21172 号

书 名: 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

著作责任者: 周志强 著

责任编辑: 张 晗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5539-4/I·2132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5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980mm 16 开本 13.5 印张 200 千字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4.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

本丛书记录下我和一群年轻同仁的一次难忘的中国现代学之旅:在过去的几年里,我们协力对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作了一次新的探究。说到传统,人们总会不假思索地以为那只是指类似于“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古代时光,而忽略“别求新声于异邦”的现代,仿佛唯有古代才配称为传统。对置身当代的我们来说,苏轼的“气自华”固然有其不容忽视的回瞥意味,但鲁迅的“求新声”却不能不说正是中国现代历史现场的真实写照。实际上,晚清以来国人在“欧风美雨”的浸润中变法自强、实施启蒙乃至燃烧革命烈火的历史,已经和正在成为中国传统,准确地说是中国现代性传统。在一次新的探究之旅中重新回望作为中国现代性传统之一方面的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恰是我们的初衷所在。

从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传统,是我经多年摸索后找到的一个研究方向。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化传统的学问,是中国人对中国现代性文化的研究。与有关中国古代文化的“国学”不同,也与外国学者从事的有关中国问题的“汉学”(Sinology)或“中国学”(Chinese Studies)不同,中国现代学主要研究百余年来中国文化现代性传统的发生、发展、演变及其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从中国现代学视野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和美学,可以更准确而深入地揭示中国文学现代性、文论现代性及审美现代性的面貌及其意义。本丛书旨在对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文论特色展开研究,即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重新考察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着重发掘中国现代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学和文论之间的互动关系。

这里选取中国现代学这一特定视角,正是企望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和创新。从中国现代学视野重新审视中国现代文学与文论,有可能更充分地认

识中国现代传统的文化身份和积极意义。传统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始终处于现实状况的选择与熔铸中。中国传统是基于现实需要并在现实中重新创造的由过去传承的符号表意系统。这种传统既有古典性传统,也有现代性传统,两者共同构成我们当今所身处其中的中国传统结构。应当在继续充分尊重和弘扬中国古典性传统的现代意义的前提下,纠正那种只强调古典性传统而忽视或轻视中国现代性传统的偏颇,跨越传统仅限于摒弃古典性传统的成见,充分认识到中国现代性传统是中国文化传统整体的一种新形态,是与古典性传统不同但却同样伟大的新传统,需要积极予以承认并加以认真研究。这种承认和研究,对于正在持续展开的中国现代性进程和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化传统建设及中国文化的个性伸张,都应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本丛书拟重点考察一些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理论家、批评家及美学家或相关问题,着力探测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论传统的积极价值,以便在当前新世纪语境中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和文论的发展历史与现状,并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作新的观照。同时,运用中国现代学视野去重新观照中国现代文学、文论与美学状况,可以揭示以往被忽略的新问题、新现象及其意义,从而为理论探索带来新的拓展空间。

本丛书的主要目的在于:在已从事的关于中国现代性体验和现代性诗学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开拓。这具体表现为在中国现代学视野中考察如下相关问题: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类型;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特征、类型等;中国现代文化传统新视野中的文论现代性研究,包括文论现代性的发生、演变、特征、类型等;中国现代学新视野中的现代重要作家、文论家、批评家、美学家研究。

纳入本丛书的六种著作各有其研究重心和特色:

胡继华的《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宗白华美学思想简论》尝试从“文化精神”角度考察宗白华在20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的美学研究,把宗白华的美学沉思与中国文化复兴事业结合起来加以观照,得出这种美学是对中国文化精神的审美维度的建构的新结论。该书进而发掘出这位美学家对于作为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象征物”的“节奏”及其文化根源的探究,揭示了宗白华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独特地位及其历史局限性。

周志强的《汉语形象中的现代文人自我——汪曾祺后期小说语言研究》把汪曾祺短篇小说同中国文学文体的现代性联系起来考察,为汪曾祺重新定位。这部书从分析汪曾祺小说语言入手,探讨“文”的文体意识在汪曾祺小说中的具体体现,以此分析短篇小说的文体功能及其不同意义,进而总结中国短篇小说文体的分化与变迁。书中有关“现代韵白”与现代汉语形象建构的分析,尤其体现了著者独到的艺术发现。

梁刚的《理想人格的追寻——论批评家李长之》引人注目地提出李长之是20世纪中国最富于独创性及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的新观点,足以令人对这位一度被遗忘和忽略的大批评家刮目相看。该书以理想人格为焦点,去透视李长之在美学批评、文化批评、文学批评和画论批评诸领域的骄人实绩,其分析的重点在文学批评这个李长之最擅长和成就最大的领域,他如何把时代文化精神的重构、作家审美人格的探究以及文学本文语言的诗意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对渴望成为文学批评家的年轻朋友,这显然是一部及时的书。

何浩的《价值的中间物——论鲁迅生存叙事的政治修辞》对鲁迅的“中间物”及其革命作了研究,从鲁迅的文学世界来反思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诸问题,可谓独出心裁、别开生面,在鲁迅研究上堪称一次大胆的创新。该书的重点不在文学史料的新发现,而在突破现有鲁迅研究范式及权威话语,在思想史层面上重新发掘出被遗忘的鲁迅对现代中国人生存意义新维度的独特建构。鉴于鲁迅对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重要性,这里重新考察鲁迅和他的“中间物”意识,有助于把握中国文学现代性传统的内涵,具有一种先锋的开拓性作用。

石天强的《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路遥的文学实践及其文化意义》把路遥置于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这一新坐标上,更清晰地凸显其在中国现代性传统中的独特价值。该书的主要切入点在空间、身份、形象三个不同视阈,具有突出的解析能力与文化意义,由此呈现出作家及其身份认同的焦虑与小说文本中个体命运的悲剧性,有助于反思中华民族现代性进程中农村和农民的焦虑和困境。

我的《中国现代学引论——现代文学的文化维度》是一部有关中国现代学问题的专论。从标举第三种现代思风入手,提出中国现代学这一独特

学科构想,规定了它的反构型学思性质,由此出发对中国现代性的特征、颜面、景观和品格作了探索,得出中国现代性是一种后古典远缘杂种文化这一新结论。全书主要结合文学个案展开论述,回放出中国现代性的丰富景观,对相关的革命主义、审美主义、文化主义、先锋主义、拿来主义等种种思潮作了评析,还对近期有关文学个案如王朔和铁凝做了阐释。

这套丛书只是中国现代学旅程的一次处子航,因而欠缺经验、行色匆匆在所难免,期待方家指正。

在筹划与写作多年的这套丛书即将出版之际,我首先要向我的五位合作伙伴表示感谢,他们是胡继华教授(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周志强副教授(南开大学)、梁刚副教授(北京邮电大学)、何浩助理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石天强副教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胡疆锋博士协助我做了相关组织工作,同时向他致谢。

本丛书属于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西方文论中国化与中国文论建设”(项目批准号为 05JZD00028)成果暨北京师范大学 985 工程第二期长江学者科研项目成果。在此谨向教育部社科司领导、北京师范大学学校领导 and 文学院领导一并致谢。

北京大学出版社文史哲图书事业部张凤珠主任本着对这次学术探究之旅的热忱,给予我们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谨向她和相关社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2009 年 5 月 1 日序于北京林莘西里

序 阐发现代韵白的魅力

王一川

汪曾祺老人在现代汉语写作中的地位不言而喻,但他却是一种特别的作家:你以为能赏就能析,未必。作品摆在那,欣赏是回事,分析则是另一回事。说他好不难,但说出为什么好则难许多。周志强博士当初意气风发地选定汪曾祺做博士论文时,想必没料到后来的艰难。好在他克服了,坚持住,完成了。成文过程也同时就是成人过程。作为他当年的导师,在这部由五年前博士论文修订和拓展的著作出版之际,我很愿意为他写点话。

志强的这部著作的关键处有二:一是研究视角,二是研究重心。从研究视角看,他选择汉语形象、现代文人认同和民间想象等综合视角去考察汪曾祺后期小说,是有独到眼光的。汉语形象概念虽然是我根据现代汉语文学研究的需要,从巴赫金的“语言形象”变通出来的,我也曾由此对以汪曾祺为代表的作家作品作了一些初始的阐发,但真正集中、完整而深入的个案分析还是由志强来做的。他认识到,汪曾祺后期写作是在国家意识形态面临转变的变动环境下完成的。面对曾经强大的汉语文学传统即“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写作传统,汪曾祺小说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现代韵白的成熟形式和民间想象的清新风貌,其在现代文学发展中的转折作用十分显著。志强依托汪曾祺的汉语写作个案展开汉语形象分析,可以凸现代文学中汉语形象的深刻困境及其脱困方略。这个视角对无论是对汉语形象研究还是对汪曾祺研究都是准确的。

不过,面对汪曾祺这个丰富而复杂的研究对象,光有汉语形象视角是不够的。他为什么如此执著于汉语形象塑造而不屑于编织复杂多变的故事情节?为什么如此偏爱短章而主动放弃长篇写作?需要刨根究底。志强发现,这根源于历经半个世纪政治与文化风云的汪曾祺老人对现代文人品位

的不懈追求。由此,志强找到了研究的另一视角:现代文人认同。注意,这里不是通常的知识分子,而是文人;不是古代文人,而是现代文人;不是现代文人的身份固定,而是其身份寻觅。由这样明确的身份界定与区别,正可以见出志强在把握中的良苦用心。

复杂的情况还在于,如果汪曾祺真的作为现代文人而非现代知识分子,那么,他要追求的东西同现代知识分子有什么两样?志强考虑的是,现代知识分子往往有其现实的国家政治想象,其精神寻求总要落脚在现实国家体制土壤中;而现代文人则常常舍此而求彼,别出心裁地另辟一种汉语中的精神空间——民间想象。这既不同于那种附丽于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体制改革上的政治想象,也不同于那些凝聚在自然名胜、文化名胜乃至传统器具上的民间想象,而是由汉语形象建构的现代文人民间想象,是汉语形象所开拓的特殊的符号与精神空间。

这样,志强不无道理地找到了具体的着眼点:以汪曾祺后期短篇小说的语言为核心,透视其语言形象所建构的现代文人认同,在此基础上打量这种文人认同与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的复杂关系,进而领略汪曾祺所塑造的民间想象的各种景观及其文化内涵。这样的框架设计是合理的。

有了合理的研究视角,还得看研究重心是否合理。汪曾祺在汉语形象方面的独特建树究竟何在?志强首先历时地梳理汪曾祺在“文革”后复出文坛的过程,从其“插语”等过渡性修辞方式中细心辨识汪曾祺的现代文人自我的显现端倪和轨迹,直到发现其独创的现代韵白的存在价值。志强敏锐地紧紧抓住现代韵白不放松,把它设定为整个汪曾祺汉语形象研究的重心,从而使研究找到了合理的落脚点。

这部著作独特的地方及其最用力处,在于发现并深探了汪曾祺独创的现代韵白这一现代汉语修辞方式。志强指出,汪曾祺的现代韵白一方面立足于古代汉语的写作传统,另一方面改造并创生着现代汉语的审美魅力,修正了近代以来崇白话而弃文言的倾向。志强进而分析说,以韵化白和化白生韵正是汪曾祺小说语言审美创造的重要方式。由文言和白话的对立所打断的“汉语”传统,终于在汪曾祺精心提炼的现代韵白中被接续了起来。由现代韵白这种新的汉语形象,可以窥见以汪曾祺为代表的现代文人自我的认同状况及其文化内涵。现代韵白呈现出不同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角色的

自我认同情形,成为一种蕴含着现代文人形象的新的汉语形象。正是在对于现代韵白的创造中,汪曾祺完成了“小说如文”这种短篇小说文体观念的生成。我认为这些把握是准确的,点出了汪曾祺在汉语形象方面的独特贡献之所在,可谓这部著作的成功与可取之处。此外,著作还深入到汪曾祺小说的历史内容层面,探讨其民间想象的具体景观和内在意蕴,认为汪曾祺以特有的文人情怀创生出一种具有新的文人意韵特色的民间想象模式,由此建构起一种与民族自我、人民自我有所不同的现代文人自我。这些都显示了志强的独特研究用心。

我以为,经过上述努力,只要能给汪曾祺独创的现代韵白一个说法、阐发它的魅力,也就基本完成任务了。人们对汪曾祺的贡献说了很多,但鲜有抓住这一点并深入阐发的。志强的才干和识见已体现在这里了。他还进一步提出自己有关汪曾祺的纵深判断和结论:汪曾祺小说难免有重语言而轻情节等薄弱处,但这绝不影响它的美学成就的确认;这位作家以其夺人的风采在现代重现文人传统的美妙韵味,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想象;他对现代白话文语言的审美创造,开创了中国小说语言的革命性转换,也促进了短篇小说的文体变革,使现代汉语在一个特定方面真正达到成熟的审美境界;由此,汪曾祺对现代短篇小说做出了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独特而重要的美学贡献。我感觉这些结论是公允的和可信的。

这部书稿如果还需要改进和延伸的地方,我以为主要在于思考的清晰度、各部分的衔接和内容的均衡上。清晰的思考有利于深钻到对象内部,发掘出更深厚的意味来。在这点上,此书宜在汉语形象的层次、现代文人的要素、民间想象的呈现等方面作更深入的发掘,并把理论推导落到具体可把握的实处。同时,我上面说的汉语形象、现代文人和民间想象三种视角之间彼此衔接还不够紧密,多少有所脱节,应当力求连贯与融汇。例如,汪曾祺老人独创的这种由汉语形象所建构的现代文人民间想象,其实是离不开现代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和普通民众的民间想象的,毋宁说,它应该是上述政治想象和民间想象在汉语形象中的一种象征性融汇方式。也就是说,汪曾祺老人的貌似远离当代政治和当代通俗的民间社会的、与汉语形象不可分离的高雅的民间想象,其实在其深层隐伏着或折射出微妙而又重要的政治维度和世俗维度。看不到这一点,就可能忽略汪曾祺以其个人政治波折换

来的政治教训与反思在他创造的汉语形象世界中的曲折投射,及其蕴含的深厚的当代意义。而从各章篇幅分布看,现代韵白的重心地位毋庸置疑,但其他部分相比就多少显得单薄、用力不足,显然需要适当增强了。内容的均衡才有助于围绕现代韵白这一重心,建构起更为合理而完整的汉语形象阐释框架。说到底,是需要对于对象的更深度和细致的深钻和琢磨。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孔之见,也多半是一种苛求,仅供志强参考。

在我眼里,志强是位富有艺术敏感、体验天赋而又才气逼人的青年学人,尤其是在课堂上可谓才华横溢,深得京津众学子喜爱。如今他在南开大学为他提供的开阔天地里发展自如。我为他的成绩感到欣慰,希望他能继续这种发展势头,同时更深地潜入学术的纵深处。记得当年我曾说过,像他这样富有才华的学人是前途无量的,但治学上更重要的不是横溢而是深钻,即不是放任才华横向地自然流淌漫溢,而是有意地做纵深的定点钻研探测。至今我仍这样认为。文艺美学研究更需要的不是向上向外向宽的横溢,而是向下向里向窄的深钻。只有冷寂的持续深钻,才会在学术上寻到一块立身之地。当然,才华横溢也有其作用,可以适度地用在艺术体验、艺术发现及课堂教学上,但治学讲究的却永远是深钻。相信志强懂得在这方面如何韧性地坚持下去,直到不断有新的开拓和收获。

2008年6月15日于北京

目 录

《现代文论与美学论丛》总序	王一川(1)
序 阐发现代韵白的魅力	王一川(1)
第一章 后期汪曾祺	(1)
第二章 “发现的故事”	(8)
第三章 文人话语的分裂	(15)
一 “访问体”与“观察视野”	(17)
二 “旁观视野”	(19)
三 互主体性与插语的修辞作用	(25)
第四章 现代韵白	(30)
一 现代白话语言的韵	(31)
二 “以韵化白”	(34)
三 白话生韵	(61)
第五章 现代文人的语言镜像	(87)
一 “视觉语言”	(87)
二 语言的形象	(97)
三 现代白话语言形象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	(109)
四 “小说如文”:短篇小说与“现代文人自我”	(110)
第六章 汪曾祺小说中的民间想象	(128)
一 民间想象的四种模式	(129)
二 风物想象与现代文人意趣	(142)
三 苦难寓言与现代文人情结	(150)
四 乡俗生活与现代文人心态	(156)

五	民间想象的第五种模式:现代文人意韵	(169)
第七章	现代文人自我	(173)
一	“民族自我”	(173)
二	“人民自我”	(179)
三	现代文人自我的审美生成	(184)
四	现代文人自我的文化内涵	(189)
五	语言与自我的双重形象	(192)
结 语		(196)
参考文献		(198)
后 记		(204)

第一章 后期汪曾祺

汪曾祺后期小说的写作是在一种整体的意识形态转变和动荡的环境下完成的。面对一个强大的文学写作传统,即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写作传统,他的小说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现代韵白的成熟形式和民间想象的清新风貌。

也正是这样一种写作语境,造就了汪曾祺对语言的强烈关注。在汪曾祺这里,“语言”已经不是一种实现意义的简单工具,而是一种蕴含着丰富政治内涵和文化意味的形式。语言创造作为文学创造的一个过程,带有认同重组和权力抵制的意义。换句话说,重新打造一种文学的语言,成为重建文学的政治形象和美学形象的方式。所以,对汪曾祺后期小说成就的关注,也就成为对这个时期小说语言文化功能和社会价值的关注。

由此,我选定汪曾祺后期短篇小说的语言为研究对象,从语言形象角度考察现代文人认同建构问题。在这里,我试图分析文人认同与现代短篇小说文体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在我的论述中,语言、文体和自我乃是三个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素:不存在单纯的“自我”,自我通过对自我形象的表达(言说、写作)实现其认同建构;而语言则是自我形象的直接投射;“文体”作为语言的固定化的组织形态,则成为“自我”的一种象征化形式。换句话说,自我认同与建立在一定形式之上的文体认同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一个作家而言,他有意或者无意地对语言和文体的选择,既是一种自我支配下的活动,也是一种塑造自我、支配自我的活动。按照这样的逻辑,汪曾祺的短篇小说,成为作家的一种独特的自我认同形式的体现。汪曾祺不把短篇小说看作是“小说”,而是把它当成“文”来写。也就是说,汪曾祺采用了“文”的语言方式来写小说,并由此完成了他对短篇小说的文体改造。在这个改造中,文体意识、自我意识和语言意识交织勾连在一起,形成了独特

的文人写作的风貌。

在这本书中,我首先着重探讨汪曾祺上个世纪70、80年代复出文坛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汪曾祺应合当时的社会感召话语,借助于一种自我解放的想象投入到文坛当中。社会政治知识范式的转型,变成了汪曾祺小说中认同重组的巨大推动力。这体现在汪曾祺复出后的第一篇小说《骑兵列传》之中。细读这个文本中汪曾祺的写作姿态和小说的“插语”修辞,可以清晰看到汪曾祺文人自我裂变托生的有趣进程。

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把这个过程通过语言的修辞形式,即语言形象呈现出来。这就有了所谓的“现代韵白”问题。汪曾祺的小说,一方面背靠古代汉语的写作传统,一方面又积极创生现代汉语的审美魅力,力求修正近代以来崇白话而弃文言的语言写作意识。在这里,以韵化白和白话生韵,成为汪曾祺小说语言审美创造的重要方式。由文言和白话的对立所打断的“汉语”传统,在现代韵白中被接续了起来。

接下,我想探讨现代韵白这一种新的汉语形象与现代文人自我的认同关联和文化意蕴。汪曾祺对于视觉语言的强调,使得它立足于汉语自身传统进行汉语形象的审美创造。汪曾祺的现代韵白呈现出不同于中国新知识分子角色的自我认同情形。现代韵白成为一种蕴含着现代文人形象的新的汉语形象。在这样的追求中,汪曾祺形成了“小说如文”这种短篇小说文体观念。

最终,我想把汉语形象与汪曾祺小说的历史内容层面放在一起进行考察,探讨其民间想象的具体景观和内在意蕴。新文学文本中,民间想象存在四种不同的模式,而汪曾祺则以其特有的文人情怀,创生了一种新的文人意韵的民间想象模式。

语言、文体、历史的缝缀,使得我们可以看清楚汪曾祺现代文人自我的具体内涵。与民族自我、人民自我不同,汪曾祺依托传统文化,用他的审美写作,创造出一个现代文人自我。

在这本书里,我过多地分析了一个小说家的语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个小说家只有语言的成就,也不意味着这种语言的成就可以掩盖一个作家其他方面的不足。事实上,汪曾祺小说难免有重语言而轻情节等薄弱处,虽然这绝不影响它的美学成就。

汪曾祺在 20 世纪末期以其夺人的风采在现代重现了文人传统的美妙韵味,再一次用他的笔墨重建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想象。汪曾祺对于现代白话文语言的审美创造,不仅仅带来了中国小说语言的革命性转换,还有效地促进了短篇小说的文体变革,使得现代汉语在一个特定方面真正达到了成熟的审美境界。可以说,汪曾祺对现代短篇小说作了一种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独特美学贡献。本文尝试从汪曾祺后期小说的文本分析入手,以短篇小说的语言形象为考察的重心,由此透视汪曾祺在其中建构起来的现代文人认同。我试图证明,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汉语形象的独特塑造,汪曾祺才在中国现代性文化的历史进程中重新获得表达和想象现代文人的权力。

事实上,汪曾祺只有进入了他写作阶段的后期,才实现了他的写作辉煌。从 20 世纪 40 年代走上文坛^[1],到 90 年代离开人世,汪曾祺的小说写作历经“三波”:1940—1948 年为第一波;1961—1962 年为第二波;1979—1996 年为第三波。其中以“第三波”的作品最多,影响也最大,这一波堪称汪曾祺小说写作的巅峰阶段。诚然,汪曾祺自己曾经反对将他的写作之路分阶段进行研究^[2],在《捡石子》一文中,汪曾祺就说:“我不大赞成用‘系年’的方法研究一个作者。我活了一辈子,我是一条整鱼(还是活的),不要把我切成头、尾、中段。何况,我是不值得‘研究’的。‘研究’这个词儿很可怕。”^[3]但汪曾祺却同意用“三级跳”去归纳自己的创作生涯,而且,进入新时期之后的“第三跳”刷新了他个人写作生涯的纪录。他说:

我二十岁开始发表作品,今年七十岁了,写作生涯整整经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写作的数量很少。我的写作中断了几次。有人说我的写作经过了一个三级跳,可以这样说。四十年代写了一些。六十年代初写了一些。当中“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样板戏”。1980 年代后小说、散文精心得比较多。有一个朋友的女儿开玩笑说“汪伯伯是大器晚成”。我绝非“大器”——我从不写大作品,“晚成”倒是真的。文学史上像这样的例子不是很多。不少人到六十岁就封笔了,我却又重新开始了。^[4]

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汪曾祺的后期小说是他一生写作的高峰。他承认自己是“大器晚成”,这其实意味着他觉得自己的后期写作才是最具审美

价值的文学写作。这并不是说此前汪曾祺的文学活动不成立,而是说只有到了后期,“汪曾祺小说”才真正成为一种可观的文学现象。简言之,是汪曾祺的后期写作造就了“汪曾祺小说”这个至关重要的表述的美学内涵和文学内涵。

在当代,汪曾祺的被“发现”始于《受戒》。这个发现,应该以1980年唐挚《赞〈受戒〉》、张同吾《写吧,为了心灵》^[5]为发端。很短时间内,全国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的关于汪曾祺的评论文章就有百余篇,掀起一股“汪曾祺热”。1988年9月,《北京文学》编辑部在京召开“汪曾祺作品研讨会”,《当代作家评论》1993年第1期专门出了“汪曾祺评论小辑”;江苏电视台还录制了一部反映汪曾祺文学生涯和文学成就的MTV专题片《梦故乡》,汪曾祺的确“行情看涨”。如果把这些年来汪曾祺研究作一个回顾的话,那么1980—1989年是初期阶段。这一时期着重于对汪曾祺小说从单篇赏析到对作品中蕴含的传统文化意识、小说的题材主旨及创作风格作较为全面的评析,并开始运用比较方法探究其艺术渊源。1990年后则可看作是汪曾祺研究的深入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研究面扩大了,散文研究开始起步,作家本人的研究也受到重视,众多研究者力图运用全新的价值观和史的观念,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并通过微观作品分析,结合创作的内部规律,对汪曾祺写作所具有的文化意蕴及艺术品格作更深入细致的综合考察,并联系当前文学状况、文化走向,对“汪曾祺热”现象作多方面解析,力图对其创作在当代文学史的地位给予中肯的评定。近年来,随着文化研究的方法逐渐引入到具体作家作品的研究中去,学术界也开始从社会和历史的特定语境中探讨汪曾祺作品的复杂体验和文化内涵。但是,纵观汪曾祺的研究,我们也可以发现种种不尽如意之处。学界对于汪曾祺小说的研究,一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显示了汪曾祺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具有不可忽视的研究价值;另一方面,汪曾祺研究又始终停留在一种作家和作品评论的阶段,学者大多没有把汪曾祺的创作与百年中国文学的历史变迁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阐释^[6]。

那么,作为20世纪70、80年代出现的一种文学现象,汪曾祺的写作为新时期和后来的文坛作出怎样的贡献呢?汪曾祺小说的审美风貌是在怎样的一种文化形势下生成的呢?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待于全面地了解汪曾祺后期小说的写作状况之后,才可以作出。